

清代苗民起义

917
5

馬少侨編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297
446

清代苗民起义

馬少併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武漢

3339463

04056

內容提要

本書敘述苗族人民在清朝反動統治的凌視、壓迫、剝削及殘酷屠殺下，從未屈服，不斷地舉行起義，並與漢族及其他各族的勞動人民一起，對清朝反動統治者展開英勇不屈的鬥爭。其中對清代苗民的社會生活，苗民反對“改土歸流”、反對“屯田養勇、設卡防苗”的鬥爭和有名的“乾嘉起義”、“咸同起義”等，都根據收集的史料，結合當時國內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作了較系統的敘述。

清代苗民起義

馬少儒編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湖北省地方國營新生公司印刷

787×1092mm 1/16開 2¹/₂印張 1精頁 47,000字

1956年9月 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6,000

統一書號：J1108·10

自 錄

第一章 清代苗民的社会生活	1
第一節 苗族人口的分布和歷史發展的傳說	1
第二節 勤勞、勇敢、智慧的苗族人民	5
第三節 清朝对苗民族的双重压迫政策	9
第二章 清朝統治勢力的擴張時代，苗民反对“改土 归流”的斗争	14
第一節 清朝初年的社会狀況和对苗民的怀柔政策	14
第二節 雍正“改土归流”的社会条件及其經過	18
第三節 雍正、乾隆苗民反对“改土归流”的斗争	24
第三章 清朝勢力的中衰时代，湘、黔苗民的“乾嘉起义”	34
第一節 清朝勢力的中衰，“改土归流”以后的苗民生活	34
第二節 石柳鄧、石三保、吳八月領導下的“乾嘉起义”	38
第三節 “乾嘉起义”的繼續發展，苗民反对“屯田养勇、 設卡防苗”的斗争	44
第四章 清朝勢力的衰落时代，貴州苗民的“咸同起义”	52
第一節 瑶片战争后中國封建社会經濟的解体，苗族人民 生活的進一步惡化，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新發展	52
第二節 張秀眉領導下的“咸同起义”斗争經過	59
第三節 “咸同起义”勝利和失敗的原因	72

第一章 清代苗民的社会生活

第一節 苗族人口的分布和歷史發展的傳說

我們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除漢人外，還有几十種兄弟民族。

據 1953 年 6 月全國人口調查：在全國人口总数六萬零一百九十三萬八千零三十五人中，漢人有五萬零四千七百二十八萬三千零五十七人，占總人口 93.94%；全國少數兄弟民族，共有三千五百三十二萬零三百六十人，占全國總人口的 6.06%。以漢人為首的中國各族人民，是中國歷史的共同創造者，是中國歷史的主人。在創造偉大的、光輝的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我們中國各民族都有著勤勞、勇敢、智慧和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光榮傳統。

在我國各少數民族中，蒙、回、藏、維吾爾、苗、彝、僮、布依、侗等一個民族的人口，都在一百萬人以上；其中苗族人口據 1953 年統計為二百五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九人。

苗族的分佈很廣，其聚居地區，主要為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的花垣（永綏）、鳳凰、吉首（乾城）、保靖；貴州的都勻、興義、鎮寧、安順、盤縣、畢節、鎮山、丹寨、雷山；四川的酉陽、秀山；廣西的

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以及云南、海南島等处。其中一个較大的聚居地区，即以苗嶺山脉为中心的湘西、黔东地区，面積約一千余里左右；人口約占苗族总人口的 85% 左右。

几千年來，苗族人民和漢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劳动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勞、勇敢和智慧，把荒山峻嶺，开辟成錦绣的河山。在流傳于貴州清水江一帶苗族地区的古歌——“蝴蝶歌”中，就敍述了人类始祖姜浹如何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生產故事：

“有的人太懶惰，
有事也不做；
姜浹很勤快，
他到斜坡去挖土，
到平地去开田；
他用衣袖当撮箕，
用手指当釘耙，
用牛角当鐵銑。……”（注一）

可以看出，苗族人民在創造中國歷史的斗争中，是付出了長期的辛勤劳动的。

苗族人民自有史以來，就生息繁長在中國的大地上。苗族人种的起源，据古代史籍記載的神話說：高辛氏的女兒与五色神犬盤蕎相配，生六男六女，自为夫妇。据他們自己的傳說，也說在上古时代，由通人性的盤蕎与北方金天公主婚配，住在貴州山巔岩洞中，生六男六女，自相婚配。但这些都不能說明其种族的起源，只能說明苗族在原始社会时代，是以犬为圖騰的部落，并与世界上其他各民族一样，曾經歷过血緣的群婚制廢。

階段。他們的另一個傳說，說在太古洪水時期，世上的人都溺死了，只剩下兄妹二人，互相匹配，才有今日的人類，因此感謝這兄妹二人，稱他們為儼公儼母；又貴州苗民每屆祭期，要設九個頭人，八個是舅爺，第九個是姑爺，據說八個舅爺的女人迎接姑爺到家，才產生了後代（注二）。這也只能說明苗族的遠古祖先曾經歷過洪水的災難，有過血緣婚和亞血緣婚，不能說是苗族人種的來源。至于苗族人種的來源問題，有人說是蒙古高原系人種，也有人說是南太平洋系人種，近年來“資陽人”的發現，又提供了新的材料。不過據中國古代史籍的記載，都說是“三苗之裔”，因此大多數史家都認為是南太平洋系人種。但正確的結論，還有待於地下的發掘。

苗族的發展史，是長期地反對種族壓迫、民族侵略的歷史。據我國古代史籍的記載，還在部落時代，苗部落就被迫退出了黃河流域的大平原，來到了“左洞庭而右彭澤”的鄂、皖、湘、贛之間。後來由於漢族勢力的不斷向南方發展，苗族又一步一步地被迫退居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自然條件很壞的湘、黔山谷之間。這一遷徙的歷史過程，在苗族人民的史詩中，還可以找到許多線索。貴州苗民有一首“古歌”，敘述了古代東方的天空有十二個太陽，十二個月亮，把天下晒得很厉害，於是大家推舉一個叫做“夏”的青年射手，到東方去射日的故事。這與后羿射日的故事，顯然是同一個來源。又苗民在祭祖時所用的犧牛，一定要從外面買來，而且一定要說是從東方買來的，祖先得了這條牛，就知道子孫還在東方，可以放心。因此，苗族人民從華北平原退到鄂、皖、湘、贛之間，再退到湘、黔

边境，是很可能的。

在長期的封建統治和种族压迫下，苗民被迫分散、离析和“漢化”，形成了居处地区的不相連系和生產發展的不平衡，漸次又表現了言語紛歧，風俗龐雜的現象。歷代封建統治者为了方便于他們的統治，便根据苗民妇女服飾（男子的服飾一般与漢人沒有顯著区别）的不同，分苗民为白苗、黑苗、青苗、紅苗和花苗……；根据苗民居处地帶的不同，分苗民为东苗和西苗……；根据苗民生產水平和“漢化”程度的不同，分苗民为“生苗”和“熟苗”。他們虽然生產水平不同，言語風俗各異，但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性格是相同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意志和目标是一致的。在歷史上千百次苗民起义斗争中，苗族人民是一个战斗的整体，給封建統治階級“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无情的打击。

苗族人民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發展过程中，还和漢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有着相互的影响。他們与中国各民族一起，以勤勞、勇敢和智慧，來創造了中國数千年光榮燦爛的歷史。例如第一次把水稻种在中國的土地上的，就是苗、瑤民族，而現在已成为中國各民族的主要粮食作物；盤古氏开天辟地的記載，也是从盤旁的傳說演变而成的，而現在也成为中國許多民族傳說中的共同祖先；前面提到的“夏”射日的故事，和后羿射日的故事，也顯然是同一淵源。

在保衛祖國和反对封建統治的斗争中，苗族和漢族人民，曾有过多少次友好的并肩作战。明朝中叶，湘西苗民三千人赴苏、松征倭，曾大敗倭于石塘灣、王江涇，史家認為：这是“軍兴

以來，戰功第一”的偉大勝利；明朝末葉，湘西苗民又參加了遼東的戰役，打擊清朝貴族的進攻，在渾河戰役中，苗族武裝以全軍的壯烈犧牲，來保衛着祖國每一寸土地；特別是在清朝入關以後，苗族人民又團結在南明永曆抗清政府的周圍，英勇抗戰。此後在清朝二百多年的民族的和階級的雙重統治下，苗族人民和漢族人民，還有過多少次共同的反清鬥爭。這些，在以後各章，將一一談到。

由此可見，中國各民族的團結，是有悠久的歷史關係的。苗、漢勞動人民的友好關係的密切，就是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富于挑撥性的記載中，有時也透露說：“苗呼漢人曰客；漢人呼苗曰同年，苗妇曰同年嫂。客至，爭設食。”（注三）但同時也必須明白：在歷史上，苗、漢民族之間，是有過長期的戰爭，有着很深的民族隔閡的。製造這些戰爭和隔閡的人，正是封建統治階級。

第二節 勤勞、勇敢、智慧的苗族人民

在長期的封建統治下，苗族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直到清朝統治時期，有一部分苗民（即封建統治者所謂“生苗”）一般還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農藝階段，甚至有些地區，還停留在“狩獵生活”階段。他們不知文字，不識曆法，結繩為契，刻木為信。可見在封建社會中，這一部分苗民的生活，还是很原始的經濟生活。

另一部分苗民（即封建統治者所謂“熟苗”），男耕女織的

農業已成为主要生產。他們的住宅聚成村寨，姓氏都仿照漢人，并通用漢語。由于居处地理条件的关系，在農業生產方面，大都开垦梯田，栽种雜糧、林木。“春夏之交，夫妇合作”，“雨不荷簍，日中不戴笠”。足見苗族人民能耐勞、能吃苦的精神。

他們不僅早就使用了牛耕，使用了鐵犁，有些地区，并且能充分地利用水力，以推轉水車、水權、水磨，从而推進了農業生產的向上發展。

隨着農業經濟的發展，他們在經濟上除了自給以外，也常与漢人交易，赶着牛馬、帶着土特產如雜糧、布絹之类，到市場上向漢人換鹽、換蚕种、換器具。糧以四小碗为一升，布以两手一度为四尺，牛馬以拳数多寡定价值。在这种原始的商業中，他們受着嚴重的不等价交換的中間剝削。

苗家妇女，最重服飾，她們在耕种之余，織布、绣花，是其主要的劳动。普通是用自己种的棉花，來紡紗、織布、并染色、绣花，她們往往費多年的精力，來完成自己美丽的服裝。在清代入的著述中，就有許多关于苗家妇女織染、刺绣的記載。

在織染方面，如黎平曹洞司的“洞錦”，以五色絨綫織成，有花木鳥獸各种精美的圖案，入水不退色；定番的紋布，潔色如雪，不沾油膩；又有斜紋布，先以“臘繪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臘則花現”，这种方法叫做臘染，現今貴州各少数民族还是精通这种技藝。在刺绣方面，更是苗家妇女的特技，通常七八歲起就学会绣花，既不打样，又不划綫，任手绣去，整齐美丽。哪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手工巧的姑娘，名声远播，一村人都觉得光荣。这充分地体现了苗家妇女的智慧和苗族人民对

劳动的热爱。

总之，苗族人民无论文化较高、较低的部分，无论男人和女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都有良好的锻炼，“男女赤足，健捷如飞，上山下岭间，奔马不能及，荆棘毒蛇不能伤”。特别是擅长鸟枪，在长时期的反压迫斗争中，“临阵交锋，最称奋勇”，“三五零星，附木依岩，莫可踪迹；或在山巅，或在沟内，上下指击，皆能有准”。足见苗族人民的健捷和勇敢。

苗族人民不仅勤于劳动，勇于战斗，而且善于娱乐。在苗族人民的民族娱乐中，有唱歌、打猴儿鼓、打秋千、斗牛等精彩的节目；有腰鼓、芦笙等有趣的乐器。在各种娱乐中，都充满着勤劳、健康、有感情、有生气的情调。

打猴儿鼓流行于湘西，多在大的祀典时用来自助，或在正月间农闲时节进行。其形式是由鼓手一人或二人边击鼓边跳舞，另由一人击腰鼓配成节奏。鼓舞的花样约有二十几种，动作极快，其状如猴，故称“打猴儿鼓”。在击鼓的同时，并选择女歌手一人领唱，观众和唱。鼓一阵，歌一阵，颇富情趣。

打秋千也流行于湘西，常在农闲或年节时举行。在玩秋千的季节里，愉快而健康的青年男女，就在寨前寨后的广场上搭起秋千架，架上扎秋千二座、四座或八座，每座系一坐板，每板坐一人，男女相间。每座旋至轮顶就停住，必须先由在轮顶这人唱歌，其余各人就其所唱的情节和歌，就是以一对七或三对一的形式循环歌唱。他们说：“习此可以却病。”（注四）可见苗族人民不仅很爱好娱乐，而且很早就知道在娱乐中可以锻炼身体。

唱歌是苗族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勞動生產時要唱歌，集會時要唱歌，祭祀時要唱歌，送別時要唱歌，而且健美、富于情感的歌聲，還是苗族青年男女求婚的特殊手段。

在貴州，男女兩相愛慕的情歌唱作“馬郎歌”，每一個村子都有一片供青年男女公開自由社交活動的草場，叫做“馬郎坡”，青年男女公開自由社交的活動稱作“搖馬郎”。每到農閑時節，青年的男子們，成群結隊的從一村到一村去“搖馬郎”，他們到了一個村子里，就在“馬郎坡”上吹蘆葉噓噓作聲，該村的少女們便盛裝出迎，雙方開始歌唱，在歌聲里談起愛情來。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雙方情投意合了，就可以談婚事；雙方的父母，在原則上是不能干涉的。

在湘西，唱歌也一樣是苗族青年男女相愛的手段。雖然沒有“馬郎坡”這一專門為公開自由社交而設的草場，但他們在赶場、集會，或者在春天采蕨挑荳，冬天割草砍柴，以及收牛獵畜的時候，都可用美麗而富于情感的歌聲，互相表示愛慕，逐漸靠近，建立感情，以後便約會；雙方了解後，便互相交贈紀念品，請媒人征求父母的意見。若遇女方父母不准，女方即自己跑到男家來；若男方家里不准時，男方也寧願帶着愛人另居（在朋友家），不要父母的家產。這種男女婚姻自由的追求，曾被漢族封建統治階級視為“野蠻”的表現，實際上這正是苗族青年歷來向封建婚姻制度作鬥爭的表現。

苗族人民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中，也充分地反映了勤勞、勇敢和智慧的民族性格。苗族還沒有形成系統的宗教，還帶有巫

術色彩。其主要的祀典，有吃牛、祭天王、答家先、还儺願等內容。大都充滿了農村公社的情調。在祀典中，除宗教儀式外，“歌舞以娛神”是其主要的內容。他們扮演象征勞動人民的“土地公婆”，扮演生產和“漁獵英雄”的故事……。由此可見，苗民對“神”的崇拜，也正是對勞動的熱愛的反映。在落后的農業和狩獵經濟生活中，人們把勤勞、勇敢、智慧的生產能手“神”化起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苗族人民從經濟生活到文化生活，從文化生活到宗教生活，都充滿了勤勞、勇敢、智慧的健康因素。在幾千年來的種族、民族壓迫下，他們頑強地勞動、頑強地鬥爭、頑強地生活下來，舊中國的統治階級終於實現不了“消滅”他們的妄想。

第三節 清朝對苗民族的雙重壓迫政策

幾千年來，苗族人民就在階級的和種族的雙重壓迫下，過着慘痛的日子。1644年大漢奸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中國土地上築起了更堅固的民族牢獄——清朝。

清朝的民族牢獄，是清皇族與大漢奸、大官僚地主武裝對中國各民族勞動人民殘酷的、野蠻的、燒殺掠奪中建立起來的。在入關以前，清皇族利用了征服內蒙古人民所獲得的人力、物力，來作為征服漢族人民的資本；在征服了漢族人民以後，又利用他們所獲得的人力、物力，來作為征服其他各少數民族的資本。在征服中國、鎮壓各族人民反抗的過程中，一貫採取空前的野蠻的燒、殺、刦掠的手段，用“焚其廬舍”，“殺其人，取

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來鼓勵“士氣”。因此，清兵所到之處，造成了“臭氣遍野，血積盈衢，所遺零星殘黎，損股折肱”，以至“村落寥寥，途次杳茫，遙聞多哭泣之声”的慘狀！其降臨在苗族人民身上的災禍是：“聚党尽誅，子女尽縛，廬舍盡毀，牲畜盡戮，……耕種田禾尽行芟刈，在倉糧尽行燒毀。”對被俘的苗民，或梟首、剝腸“示眾”，或“發功臣家為奴”，直至迫使苗民“立脚不牢，安身不住，扼喉絕吭而後已”（注五）。

在清皇族和漢奸大地主的野蠻掠殺下，漢族、苗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劳动人民所遭到的灾害是共同的，利害是一致的。清皇族利用內蒙古人民財力、人力征服漢人的戰爭，使內蒙古人民遭受到死亡和破產；清皇族利用漢人的人力、財力征服苗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戰爭，使漢族人民遭受到死亡和破產。而圈占土地，掠奪財物，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各族人民進行奴役的，正是清皇族和漢民族中的地主分子。

清皇族不僅以屠殺手段來完成它對中國的征服，並且以製造民族歧視、挑撥民族團結等傳統的“以夷制夷”的手段，來鞏固其對中國各民族特別是苗民族的統治。

在清皇族入關以前，元、明兩代的統治者，都對苗族施行“懷柔”政策，通過土司制度間接加以統治。清初為了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清鬥爭，便因襲明制，對苗族的統治繼續施行土司制度，在政治上把苗族降為附屬的被統治地位。因之，在經濟上，苗族人民則受着土司及清朝統治集團的雙重剝削。在剝削和壓迫苗族人民的行動上，土司與清朝皇帝的立場是一致的，各個土司對於皇帝一般都有“鉗制群苗之責”，都有稱臣納貢的

义务。而土司則經常以納貢為借口，加倍剝削苗族人民。“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一取子妇，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注六）雍正“改土歸流”以後，廢除了土司的世襲制度，對苗民的統治，由清朝政府派流官直接辦理。這些作官的人，以民族征服者的身份跨入了苗疆，以民族統治者的地位，對苗族進行民族的和階級的雙重壓迫。隨著清朝官吏的跨入苗疆，滿、漢地主階級和高利貸商人，也接踵跨入了苗疆，向苗族人民進行殘酷的掠奪。對這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清朝皇帝曾親口承認說：“貴州、湖南等處苗民，……地方官吏及該處土著及客民等，見其柔弱易欺，恣行魚肉。”（注七）在滿、漢官吏及地主分子和高利貸商人的掠奪下，苗民的土地財富，便逐漸為這些吸血蟲所占有。因此，不斷地掀起的苗族人民反清鬥爭的內容，也就是階級鬥爭的內容。

其次，清朝統治者對苗族所採取的“以夷制夷”的政策的內容，就是“民族同化”和“种族分化”的內容。其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造成苗民內部的分化和苗、漢民族之間的隔閡，以轉移苗、漢人民的反清鬥爭的目標。

清朝統治者為了推行其“以夷制夷”的毒計，對漢人曾頒布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違疑者同逆命之寇”的所謂“薙髮令”，企圖進一步從形骸上、精神上來奴役漢族人民。而對苗民族則採取“唯寨長薙髮”的制度，把薙髮當作對苗族中的地主分子的一種“恩賜”，並以示“民、苗有別”，以促進苗民族內部的分化和苗、漢人民之間的隔閡。

改土归流以后，又把雍髮遍施于所謂“熟苗”，以区别于“生苗”，逐步达到“滅其族类”的目的。正如康熙时湖南学政潘宗洛說的：“撫苗之法，当先施于‘熟苗’，‘熟苗’漸馴，可化为民，而后‘生苗’可化为‘熟’。”这就是統治階級采取民族同化政策的自供。

同时，为了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也为了轉移苗、漢人民反清的目标，还采取了雍髮令以外的許多狠毒的手段，來制造苗、漢民族之間的矛盾。首先是利用漢人管制苗人：康熙时湖南靖州、通道等縣，“分編五里一漢四苗，各輸租賦，而准其考試者，止有漢人”。乾隆时貴州“分配各寨漢三苗一，俾漢、苗雜居，強弱相制”（注八）。从而剝奪了苗族人民在政治、文化上的同等权利。这种民族的不平等，还表現在市場貿易上的种种限制：“著寨長于开市之日，押苗人以同來，复押之以同往”，不容許苗民有交易的自由。特別是为了分化苗、漢人民的團結，在雍正五年（1727），湖南总督傅敏还頒布了禁止漢、苗結親的命令，以免苗、漢人民通过婚姻关系團結起來，共同反对清朝的压迫，竟提出：“凡已經婚配者，姑免离異；其聘定未成者，自本年为始，不許違例嫁娶，犯者从重处治；已經婚娶之兵，則远移別汎；民則着保甲取結，汎守弁員，稽其出入。”此外，在康熙年間，湖廣总督俞益謨还制訂过“禁苗條約八款”，其主要内容有：“尔殺內地一人者，我定要两苗抵命；尔搶內地一人者，我定要拏尔全家偿还。……如有执刀槍行走者，即系逆苗，拏獲定行誅戮；……如有抗不納糧当差者，即系逆苗，管尔官員申报到日，定行指名捉拏正法。……”（注九）在清統治者又“分

化”又“同化”的民族高压政策下，造成了苗、漢民族之間的嚴重的隔閡，也從而造成了苗族人民經濟上、文化上的顯著落後。苗族人民長期地停留在“刀耕火耨”的經濟生活中，和“刻木為信”、“結繩為契”的文化生活中，這都是長期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慘痛的結果，特別是清代末葉，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在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上的不等價交換的結果。

但是，清朝政府的殘酷屠殺和剝削，並不能把苗族人民的反清鬥爭鎮壓下去，清朝統治者愈是採取血腥的屠殺手段，苗族人民的反清鬥爭也就愈加尖銳壯烈，一直到清末，苗族人民始終堅持了“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起義鬥爭。在每次起義鬥爭中，英勇的苗族人民，一批批在戰鬥中倒下去，又一批批在戰鬥中站了起來，繼續堅持鬥爭。其中如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貴東九股苗民的起義，乾隆60年（1795—1806）至嘉慶11年（1795—1806）湘、黔苗民的起義；以及咸豐5年至同治11年（1855—1872）貴州苗民起義，都有力地打擊了清朝統治階級。

注一 “蝴蝶歌”（“民間文學”1955年8月号）。

注二 唐春芳：“貴州苗族的民歌”（“民間文學”1955年8月号）。

注三 鄭教耀：“釋苗”（“經世文續編”卷八八）。

注四 以上均見光緒“湖南省通志”卷末。

注五 光緒“湖南省通志”卷八四。

注六 魏源：“聖武記”卷七。

注七 “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七。

注八 李宗昉：“黔記”卷二。

注九 光緒“湖南省通志”卷八四。